

印信抑或护身符：古埃及的贝印

——兼论古代中国的“贝”

杨 斌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考古和博物馆收藏的实物，对古埃及的海贝印章〔以下称贝印（cowroid）〕，也即仿造海贝形状制作的印章，作一挂一漏万的考释。本文先介绍什么是海贝（cowrie shells），特别是印度洋马尔代夫出产的货贝（*Monetaria moneta*）和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以区别于大众所说的贝壳。而后转入正题，介绍什么是古埃及的贝印，并逐一介绍北美大都会博物馆等几个博物馆收藏的贝印；接着转向欧洲博物馆的藏品，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500多枚贝印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对古埃及贝印的功能、特点和性质略加分析、总结和比较，指出其作为护身符的功能或大于印信。最后分析亚非欧大陆早期文明普遍存在的海贝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指出先秦时期的海贝来源也是马尔代夫；海贝在商周社会是贵重物，但并非货币；虽然如此，战国时期仿制的铜贝（蚁鼻钱）以及带有“贝”字铭文的金属货币都体现了海贝通过北方草原之路在中国文化和货币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而元明时期新创的表示海贝的字如“𧇵”“𧇶”“海𧇵”以及“考黎（喀嚟）”，也昭示了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印度洋海贝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海贝（cowrie shells） 货贝 环纹货贝 贝印（cowroid） 古埃及 马尔代夫 货币 铜贝 蚁鼻钱 先秦中国 草原之路 丝绸之路

序 言

古埃及的印章文化，在世界上可谓渊源最早（之一），功能完备，艺术特色非常突出。笔者曾经介绍过在古埃及社会中影响深远的圣甲虫印章（包括封泥）^[1]。和陆地昆虫圣甲虫相似，海洋生物海贝（cowrie shells）在古埃及也被仿制成印章，虽然考古发现的实物没有圣甲虫印章数目那么庞大，但也有数以千计之多。

本文根据考古和博物馆收藏的实物，对古埃及的海贝印章〔以下称贝印（cowroid）〕，也即仿

[1] 有关古埃及印章的流变，参见Wegner, J.,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Seals and Sealing Systems,” in M. Ameri, S. Costello, G. Jamison, & S. Scott (Eds.), *Seals and Seal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Case Studies from the Near East, Egypt, the Aegean, and South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29—257. doi:10.1017/9781108160186.017. 关于埃及的圣甲虫印章，中国学者最早关注的是孙慰祖先生；亦可参见拙作《金龟子印中的古埃及》，西泠印社编：《篆物铭形——图形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版，第76—94页。

造海贝形状制作的印章，作一挂一漏万的考释。本文先介绍什么是海贝（cowrie shells），特别是印度洋马尔代夫的货贝（*Monetaria moneta*）和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以区别于大众所说的贝壳。随后转入正题，介绍什么是古埃及的贝印，并逐一介绍北美几个博物馆，尤其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贝印；接着转向欧洲博物馆的藏品，特别是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500多枚贝印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对古埃及贝印的功能、特点和性质略加分析、总结和比较，指出其作为护身符的功能或大于印信。最后分析亚非欧大陆早期文明普遍存在的海贝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指出先秦时期的海贝来源也是马尔代夫；海贝在商周社会是贵重物，但并非货币；虽然如此，战国时期仿制的铜贝（蚁鼻钱）以及带有“贝”字铭文的金属货币都体现了海贝通过北方草原之路在中国文化和货币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而元明时期新创的表示海贝的字如“𧇵”、“𧇶”、“海𧇵”以及“考黎（喀嚟）”，也昭示了海洋丝绸之路带来的印度洋海贝文化的影响。

海贝和古埃及的贝印

什么是古埃及的贝印？在英文中，海贝印章对应的单词是cowroid，字典的解释为“an inscribed Egyptian seal in the shape of a cowrie”（形状似海贝的古埃及印章）。以此推论，则这类印章因为形状模仿海贝而命名，这和圣甲虫印章因为形状模仿金龟子（屎壳郎）如出一辙。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印章是圣甲虫和海贝的合体，不过是把海贝的背部替代了圣甲虫的背部而已。^[1]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古埃及人挑选海贝并仿制海贝来制作印章呢？这必须先介绍海贝及其特色。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海贝就是海洋出产的贝壳，或者就是海洋生物的外壳。我们知道，贝壳是生活在水边的软体动物的外壳，是软体动物的一种特殊腺细胞的分泌物所形成的保护身体柔软部分的钙化物。和自然界中天然碳酸钙矿物质相比较，贝壳的结构多尺度、多层状，而且韧性好、强度高。以此推论，我们日常所说的海贝，就是生活在海里的动物（多数为软体动物）的外壳。我们在海滩上漫步时，经常会发现被海浪冲上海滩的贝壳，它们往往是空的，因为里面的生物已经死亡，软体部分（通常所指的肉）已经被其他生物食用或者腐烂。这种大众心目中的海贝，大致就是海洋里出产的贝壳的简称，相应的英文为sea shell，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海贝。

对于学者而言，海贝指的是一种海洋腹足纲软体动物（marine gastropod mollusks），也就是文献中对应的英文名字为cowries 或cowrie shells 的海洋动物。这类海贝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一亿多年，在亚非欧大陆的史前考古中都有它们的身影。今天它们主要生活在南北纬30度之间的热带和亚热带海洋的浅水里，一般水深不超过5米，但也有少数海贝生活在50米以下的海域。

全世界大概生活有200多种海贝，本文专注的不过是其中两种。这两种，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曾经作为货币使用，因而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第一种是货贝（*Cypraea moneta*或*Monetaria moneta*）。它之所以如此命名，就是因为它的货币功能。它的英文名为money cowrie（money cowry），意思是钱贝、货贝；中文名为黄宝螺，俗名白贝齿。另一种是*Cypraea annulus* 或*Monetaria*

[1] Faya Causey, *Ancient Carved Ambers in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Getty Publications, 2012, 211.

annulus，中文名为环纹货贝，又称金环宝螺，其俗名也叫白贝齿。这两类海贝在中文中都有白贝齿的俗称，可见非常容易混淆。一般说来，环纹货贝背部有一道环纹，因此而名，同时体积略大。两者虽然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但前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后者，是最重要、最主要的货币。

货贝是印度洋马尔代夫群岛的特产。和其他地区出产的货贝相比，马尔代夫的货贝以体形较小而闻名，长不过2厘米，宽大约1厘米，高不过1厘米，具有携带、运输方便的优点，故能在亚非欧大陆最为畅销。从马尔代夫出发，数以亿计的货贝自史前到19世纪曾经运往印度、东南亚、非洲、欧洲乃至新大陆，并从4世纪开始在印度、东南亚、中国和西非等广大区域（间或掺杂着环纹货贝）逐渐作为货币存在，创造了人类经济史和货币史上的奇迹。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货贝对于人类的作用，无论从空间和时间而言，都超出了其他货币，如金、银、铜钱，或者现在的电子货币，因而是最早的全球性货币。

海贝的繁殖也很有意思。多数是卵生，但也有少数是胎生。出生之后，海贝成长得很快，有一些一年就可以成年，货贝和环纹货贝则需要两到三年。这两者都生活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温暖的浅水区，珊瑚和礁石是它们优良的栖息地。东至夏威夷，南至新西兰，西至莫桑比克，北至日本，都有发现，如图1和图2所示^[1]。图1为货贝的分布区域，图2为环纹货贝的分布区域。

在古代，海贝因其下部与女性外生殖器相似，而背部隆起又似孕妇的腹部，加上其善于繁殖，数量巨大，被视为生育的象征，在许多地方包括埃及被当作生育的护身符。因此，海贝状印章在古埃及的出现，和其生殖崇拜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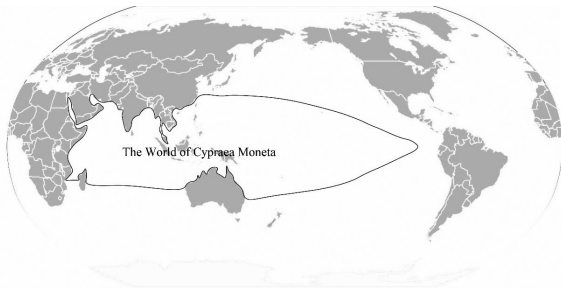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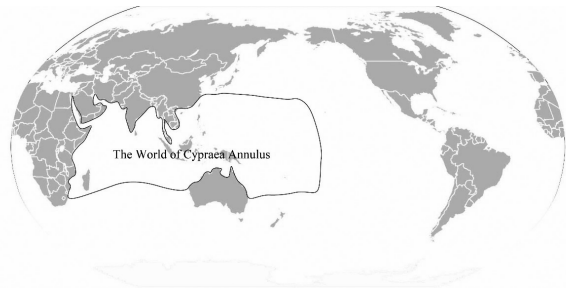


图2

北美博物馆所藏贝印一瞥

古埃及出土的贝印数量虽然不能和圣甲虫印相比，但世界各大博物馆（不计埃及的博物馆）所藏也达千枚之多。以下笔者根据美洲和欧洲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藏品，对贝印一一枚举介绍，而后试图作一综合分析。

图3贝印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集印章和护身符为一体，时间约在公元前1492至1479年间，即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二世（Thutmose II）执政期间。^[2]材质为上釉彩陶（faience），长2厘米，宽1.2厘米，高0.5厘米，前后穿孔，大小和真的货贝几乎一样。有关古埃及王朝年代，参见表1。

[1] Felix Lorenz and Alex Hubert, *A Guide to Worldwide Cowries* (Wiesbaden: Hemmen, 1993), 204—205.

[2]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48966>. 2020年3月4日浏览。

像其他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一样，图特摩斯二世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真名，也就是图特摩斯；另一个是王名（praenomen王衔，或者称假名），即阿克柏伦拉（Akheperenre）。阿克柏伦拉是一个与埃及太阳神拉（Re/Ra）相关的名字。这枚贝印刻的就是“阿克柏伦拉”这个王名。



图3

这枚贝印的发现也值得一说。在一个叫Hatnefer贵妇人的墓中，发现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妇女的棺材。在不知姓名妇女的棺材里，有一个眼影罐；眼影罐里共有六枚贝印，其中三枚都刻着“阿克柏伦拉”。六枚中的五枚被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另一枚收藏在埃及的开罗博物馆。

图4是Hatnefer贵妇人墓中发现的另一枚贝印，时间约为公元前1492至前1473年。^[1]此印材质为赤铁矿石（Hematite），黑色，四周包金，包金的两侧有敲击后形成的凹点，使其与海贝更为相似；长1.15厘米，宽0.65厘米，高0.3厘米；印面刻有文字“ankh”，意思是生命。这枚贝印前后包金有孔，可以佩戴，应该是护身符。而“ankh”之印文在贝印中经常出现，大概表示长生的祝福吧。



图4

表1 古埃及王朝^[2]

	王朝	Breasted 氏观点	Shaw氏观点
早王国	第一王朝	3400—2980	3000—2686
	第二王朝		

[1]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49044>。2020年3月5日浏览。

[2] 古埃及朝代纪年大致框架基本确定，王朝确切时代仍有争论，特别是古王国之开端有三四百年差别之争。此表收录Breasted 氏20世纪初的研究结果和Shaw氏21世纪初的研究结果，以供参考。第二十七王朝以后的编年则补充以蒲慕州的结论。参见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Vol.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sections 58—75; Ian Shaw,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79—483; 蒲慕州: 《法老的国度: 古埃及文化史》, 台湾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续表)

	王朝	Breasted 氏观点	Shaw氏观点
古王国	第三王朝	2980—2900	2686—2613
	第四王朝	2900—2750	2613—2494
	第五王朝	2750—2625	2494—2345
	第六王朝	2623—2475	2345—2181
第一中间期	第七王朝	2475—2445	2181—2160
	第八王朝		
	第九王朝	2445—2160	2160—2025
	第十王朝		
中王国	第十一王朝	2160—2000	2125—1985
	第十二王朝	2000—1788	1985—1773
第二中间期	第十三王朝	1780—1580	1773—1550
	第十四至十七王朝	缺	
新王国	第十八王朝	1580—1350	1550—1295
	第十九王朝	1350—1205	1295—1186
	第二十王朝	1200—1090	1186—1069
第三中间期	第二十一王朝	1090—945	1069—945
	第二十二王朝	945—745	945—715
	第二十三王朝	745—718	818—715
	第二十四王朝	718—712	727—715
	第二十五王朝	712—663	747—656
晚期王国	第二十六王朝	663—525	664—525
	第二十七王朝	525—404	
	第二十八王朝	404—?	
	第二十九王朝		
	第三十王朝	? —343	
	第三十一王朝	343—332	
希腊化时代	第三十二王朝	332—304	
	托勒密王朝	304—30 (以上均为公元前)	

1906年，大都会博物馆成立埃及艺术部。成立这个部门的目的是要到埃及去开展考古，为大都会博物馆添加埃及的藏品。1910年，埃及在文物最丰富的底比斯给大都会博物馆的考古队专门划出了一块区域，他们在那里展开了24次挖掘，所获颇丰。

图5为1910—1911年考古队在底比斯发掘的一枚贝印，蓝釉彩陶，长2.1厘米，穿孔。^[1]印面刻有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三世（公元前1390—前1353）的王位名“尼贝玛阿雷尼

[1]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51437>。2020年3月5日浏览。

（Nebmaatre）”，意思是“真理之主是拉（Re is the lord of truth）”。如图所示，从上到下三行共三个字。顶部是太阳神拉。中间是女神玛亚特（Maat），象征着秩序、公正、真理、智慧和和谐（头顶鸵鸟的羽毛即玛亚特之象征）。“Maat”用作文字代表着真理。底部为“neb”，意思是“主人（lord）”。

每一个埃及法老都有五个名字，除了出生的名字外，其他四个包括这里的王位名都是法老登基后选定的。因此，这四个名字都传递了强烈的文化传统、政治蓝图和个人气息。此印面表明阿蒙霍特三世把自己和太阳神以及真理和公正联系在一起，显示了政权、神权和真理的结合，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果然，在他治下，第十八王朝取得了空前的繁荣，而他本人也获得了“伟大的阿蒙霍特（Amenhotep the Magnificent）”的称号。

无独有偶，英国诺里奇城堡博物馆（Norwich Castle Museum）也藏有一枚类似的贝印，滑石，蓝釉，长1.7厘米，宽1.2厘米，高0.7厘米，前后穿孔。^[1]椭圆形的印面同样刻有阿蒙霍特三世的王位名“尼贝玛阿雷尼（Nebmaatre）”。已发现有相当多的贝印刻有此名字。这从侧面证明了阿蒙霍特三世统治下长久的繁荣，而这种繁荣代表着法老的成就，在其死后也随着这类贝印永被铭记，永不磨灭。

1926—1927年，考古队在底比斯的停灵庙（Deir el-Bahri）对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或Hatshepsowet，约公元前1508—前1458）的陵墓展开了挖掘。“Hatshepsut”的意思为“最高贵的女士（foremost of noblewomen）”。哈特谢普苏特是第十八王朝法老（约公元前1479—前1458年在位），也是古埃及第二位可考的女性法老，非常有名，有历史学家称她为第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女人。她的父亲图特摩斯一世去世后，因为王后雅赫摩斯没有儿子，所以庶出的同父异母弟弟就继承了王位，成为图特摩斯二世。因为出身不够，图特摩斯二世必须迎娶一位具有纯正王室血统的女子为妻，因此他娶了自己的姐姐、前任法老嫡女哈特谢普苏特。

图特摩斯二世体弱多病，婚后三年突然死亡。由于哈特谢普苏特只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从妃子生的王子当中推举了一个男婴登基，成为法老图特摩斯三世，而身为太后的哈特谢普苏特成为他的监护人和摄政。不久，哈特谢普苏特将大权一手掌控，宣布自己为法老。为了强调自己的合法性，哈特谢普苏特宣称自己是阿蒙神之女，宣称自己的王位不是因为婚姻得来，而是因为自己的血统而来。因此，她的雕像常以男性面目出现。哈特谢普苏特在位二十一年，执政期间埃及繁荣富庶，她



图5



图6

[1] Faye Kalloniatis, *The Egyptian Collection at Norwich Castle Museum: Catalogue and Essays*, Oxbow Books, 2019, 169.

也趁机大规模地修筑神庙，包括底比斯的停灵庙（Deir el-Bahri）。

此次挖掘发现了299枚印章，主要是圣甲虫印，也有少量的贝印。这些贝印背部或刻有精致的边框，或刻有罗非鱼（非洲鲫），或刻有头戴阿提夫王冠（atef-crown）的展翅之鹰。^[1]印面则刻有哈特谢普苏特拥有的各种头衔，包括她父亲图特摩斯一世在世时她的头衔“王女（king's daughter）”，她的异母弟和丈夫图特摩斯二世当政时她的女王头衔，以及她的继子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时她的头衔摄政和同治（regency and co-reign）等。

图6便是其中一枚贝印的印面和背部。^[2]此印滑石，绿釉，长2.2厘米，宽1.3厘米，高0.5厘米。背部精心刻有旋纹边框；印面为“Maatkare”（哈特谢普苏特的王位名），意思是玛亚特（Matt）是拉的生命力、灵魂。女神两侧的象形文字意思为“愿她永生”（“May She Live”或者“Living”）。

图7是另外一枚贝印。^[3]此印滑石，绿釉，长2.2厘米，宽1.4厘米，高0.7厘米。印面刻有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的私人名字“hat-shepsut（最高贵的女士）”；背部刻有头戴阿提夫王冠（atef-crown）的展翅之鹰。

图8是其中的第三枚贝印。^[4]此印滑石，绿釉，长1.9厘米，宽1.3厘米，高0.5厘米。印面刻的依然是“Hatshepsut（哈特谢普苏特）”。这个称谓一般和神的妻子（God's Wife）相关。哈特谢普苏特嫁给她的异母弟法老图特摩斯二世时得到了这个称谓，等到她成了法老的时候，就把这个头衔赐给了她的女儿Neferture。此贝印的背部刻有旋纹边框，框内是正在觅食水生植物的罗非鱼，形象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

罗非鱼是埃及最常见的鱼，除了其食用功能外，还有深刻的宗教含义。它被认为是重生、复活（rebirth）的象征，因而常常在墓壁上发现它的形象。同理，埃及的《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中，在对死者的祝愿中也提到罗非鱼，相信它们陪伴亡者在复活的道路中。这样，这个贝印中的罗非鱼包含着哈特谢普苏特复活的美好祝愿。这和法老死后被制成木乃伊下葬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在哈特谢普苏特的墓葬里发现雕刻罗非鱼的贝印，对于想复活的法老，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图7



图8

[1] Atef-crown 是欧西里斯（Osiris）的王冠。欧西里斯是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掌管阴间，同时也是生育之神和农业之神。

[2]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49724>。2020年3月4日浏览。

[3]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47747>。2020年3月5日浏览。

[4]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47664>。2020年3月5日浏览。

罗非鱼对于这位不甘“垂帘听政”的女法老还有更重要的宗教含义。罗非鱼和古埃及的女神哈索尔（Hathor，或称哈托儿）密切相关。哈索尔一身多任，既是爱神、美神、性爱之神、舞蹈之神、音乐之神，也是母亲和儿童的保护神，还是女王的象征。作为天空之神，传说哈索尔每天陪伴并保护着太阳神拉穿越天空，又说她是拉的眼睛（the Eye of Ra）、拉的女儿、拉的妻子以及王权守护神荷鲁斯的妻子等。因此，哈索尔被认为是尘世间法老象征性的母亲。哈索尔还能够穿越明冥二界，帮助死者的灵魂安全穿越到死后的世界。哈索尔经常被描绘成一头母牛，象征着她女性和天神的特点。哈索尔这位女神在神权和政权中具有不同非凡的角色和含义，和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的经历、渴望吻合之处极多。因此，罗非鱼的出现，不仅表明了她复活的愿望，也象征了她超越一般法老的雄心以及作为女法老的非常之处。

透过这几枚贝印，我们不仅可以管窥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上位的历史途径，而且可以感受到她自我宣称的赫赫威严；而在其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诠释下，我们还能品味她为了自己王位的合法性而精心构建的政治和宗教的重重帷幕。哈特谢普苏特死后，继子图特摩斯三世独立治国。大概对这位继母和女王心存厌恶，图特摩斯三世下令将刻有哈特谢普苏特名字和形象的雕像全部毁去。这个举动，给三千多年后的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学者确认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的存在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和争议。考虑到这个插曲，底比斯发现的这些贝印弥足珍贵。

罗非鱼常见于贝印，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就藏有罗非鱼肖像的贝印（图9）^[1]。此印时代为第十八王朝早期，材质为滑石，绿釉，穿孔，长2厘米，宽1.4厘米，高0.4厘米；印面为两条罗非鱼。



图9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有新王朝时期的贝印一枚（图10），时间大约是第十八王朝中期（公元前1450—前1350）。^[2]材质为滑石，上釉，长为1.2厘米，印文未释读。这枚贝印的背面中间隆起，到四边后平坦，四边刻有环纹，其形状和真实海贝惟妙惟肖。从印面的照片可以看出，此贝印中间穿孔，当用来系绳以佩戴。则此枚贝印集印章与护身符于一体可知。

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有贝印数枚。其一为蓝釉滑石（或彩陶）贝印（图11），形状和图特摩斯二世王印颇为相似，不过时代要比后者晚。这枚贝印属于阿蒙霍特三世时期（Amunhotep III），约公元前1390至前1352年。长2.2厘米，宽1.3厘米，高1厘米；印文为“王后泰伊（Tiye）”。Tiye是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三世的王后，出身平民，是埃及最出名的

[1] <https://www.imj.org.il/en/collections/570424>。2020年3月5日浏览。

[2] <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15.19#>。2020年3月5日浏览。



图10



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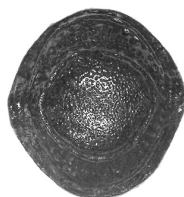


图12



图13

平民王后。泰伊在11岁（约公元前1387年）或12岁时嫁给阿蒙霍特三世，成为王后，阿蒙霍特三世对她宠爱有加。她是法老阿蒙霍特四世之母，以及著名的图坦卡蒙的祖母。阿蒙霍特三世曾经下令制作了许多金龟子印，印文记载了他在位时的许多大事，而王后泰伊就经常在这些印文中被提及。这枚贝印和其他类似的圣甲虫印都显示了泰伊的崇高地位。

第二枚为图坦卡蒙时期（约公元前1336—前1327）的贝印（图12）^[1]。材质为彩陶。和其他贝印不同的是，它的形状不是长椭圆形，而略似圆形，直径为1.3厘米，高0.7厘米，穿孔。印文“Ankhsenamun”，意思是“她为阿蒙（Amun）而生存”。Amun起初不过是底比斯的一个地方神祇，直到第十八王朝时才上升为埃及普遍承认的主神，甚至走出埃及成为宇宙之神。法老们把自己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阿蒙，并在阿蒙的神庙耗费了无数的财富。Ankhsenamun 是人名，她是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与王后纳芙蒂蒂（Nefertiti）的女儿，后来嫁给同父异母的弟弟图坦卡蒙，两人感情很好。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第三枚贝印，时间为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前1295），滑石蓝釉，近似圆形，直径1.4厘米，高0.7厘米。（图13）^[2]印面两侧为圣蛇（Uraeui）的哈索尔头像（Head of Hathor Flanked by Uraeui）。这个印面富有繁复而深刻的宗教寓意。

我们此前提过，哈索尔是功能众多的女性主神，故此印兼为护身符。哈索尔化身很多，她最常见的形象是带着角和太阳轮头饰的女性（两只角呈“U”形托住太阳）。

Uraeus即圣蛇，是眼镜蛇的直立形式，它在古埃及是主权、王室、神灵和神圣权威的象征。

[1]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33762/cowroid-ankhsenamun>。2020年3月5日浏览。

[2]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33764/cowroid-head-of-hathor-flanked-by-uraeui>。2020年3月5日浏览。Uraeui是Uraeus的复数形式。

它又是女神瓦吉特（Wadjet）的象征。在埃及神话中，瓦吉特原本是德普（Dep，古埃及前王朝时期下埃及的一个重要城市）当地的女神，一直是下埃及的守护神。她盘绕太阳的形象名为圣蛇（Uraeus），是下埃及王冠的象征。后来上下埃及统一，瓦吉特便和上埃及的秃鹰女神奈赫贝特（Nekhbet）一起成为埃及的守护神。

瓦吉特又和“拉的眼睛（the Eye of Ra）”密切联系。“拉的眼睛”是一个独立的神祇，其实就是太阳神拉的女伴。她常以太阳轮状出现，代表着太阳神力量的延伸，具有征服敌人的强大力量。其人格化的形象为哈索尔、瓦吉特、塞赫麦特（Sekhmet，战争女神和医疗女神）、芭斯特（Bastet，猫首人身的战争女神和家庭守护神）以及姆特（Mut，阿蒙的妻子，有埃及的女主人之称）等女神。此外，在有些神话中，太阳神拉的双眼（the Eyes of Ra）就是两条圣蛇。而哈索尔被描绘成圣蛇时，她代表的就是凶猛的保护神。

因此，圣蛇盘绕的哈索尔头像这个印面传递的信息纷繁复杂。哈索尔和圣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间牵涉的元素特别多，除了神权、王权，还有性别因素。笔者认为这枚印章护身符很可能属于第十八王朝某位王室女性。

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也收藏有92枚贝印，不再一一赘述。不妨来看看大英博物馆收藏的500多枚贝印。

大英博物馆所藏贝印

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大约530枚贝印。^[1]笔者搜索得到的516个含有“cowroid”的条目中，约三分之一有图片，绝大多数提供了年代判断。根据这500多枚贝印（除去包括近代伪作6枚），笔者略加统计和分析。（见表2）

表2 大英博物馆所藏贝印年代统计

朝代	数目	备注
早王国和古王国（前3400—前2465）	1	此枚标明为青铜时代晚期
第一中间期（前2475—前2160）	2	
中王国（前2160—前1788）	48	
第二中间期（前1780—前1580）	91	
新王国（前1580—前1090）	285	标明第十八王朝的64枚；第十九王朝的2枚
第三中间期（前1090—前663）	0	
晚期王国（前663—前332）	47	标明第十二王朝的7枚
希腊化时代（前332—前30）	3	
总计	477	

[1] https://research.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search.aspx?searchText=cowroid&view=list。2020年3月6日浏览。笔者搜索“cowroid”一词，出现了516个条目，绝大多数是一枚贝印，但个别是一组贝印，或者装饰品如项链、挂坠中含有数个贝币。

以上标注年代的贝印共计477枚，其中有几枚因为不能确认属于相邻的哪个时代，笔者统计时将两个时代都计入；此外，还有四五十枚贝印博物馆未标注年代。

由表2可知，古埃及的贝印起源似乎与其文明同步，在青铜时代晚期便出现了贝印。不过，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贝印极为罕见，在埃及社会并未流行，恐怕还只是个别贵族的旨趣。到了中王国时期的三百多年间，贝印迅速地流行开来，在此后的第二中间期的二百年间蔓延势头迅猛。随后的新王国时期（共490年），贝印进入鼎盛阶段，尤其是在第十八王朝，贝印成为法老和贵族的伴侣（上节讨论可以互证）。不过，大概到了新王国的末期，贝印就衰落了，以至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没有第三中间期的贝印。到了晚期王国，似乎出现了复古的现象，贝印又频繁出现，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代贝印才逐渐衰微。

这是根据大英博物馆藏品进行的分析，可能有失偏颇。不过，这个趋势和考古以及其他地方的发现是基本吻合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大英博物馆所藏贝印的材质和制作。

表3 大英博物馆所藏贝印材质

材质	数量	百分比（%）
滑石（steatite）	315	77.39
合成物（composition）	60	14.74
红玉髓（carnelian）	12	2.94
玉（jasper）	9	2.21
玻璃（glass）	4	0.98
青金石（lapis lazuli）	2	0.49
方解石（calcite）	1	0.25
玛瑙（agate）	1	0.25
玄武岩（basalt）	1	0.25
燧石（chert）	1	0.25
水晶（crystal）	1	0.25
总计	407	100

因为有些贝印并未注明材质，故上表统计只有407枚。其中，滑石占了绝大多数（77.40%）；第二位是合成物（应该是指陶），但只占14.74%；随后是红玉髓、玉和玻璃，各占2.95%、2.21%和0.98%；剩下的青金石、方解石、玛瑙、玄武岩和燧石各只有一枚而已。

滑石作为贝印材质的首选，是有其物理特性的。滑石通常是含镁的岩石在地下经长期物理和化学反应而成的，是最软的矿物，光滑细腻，一般为白色，略带青色或绿色，半透明，呈现油脂或珍珠光泽，普遍用作雕刻的材料。

低温烧制的陶也具有和滑石相似的物理特征。首先，质地细密和硬度很低，容易雕刻；其次，制陶的时候可以按照印章的大小先做稍大的块状物，避免天然矿料必须打磨成小块的过程；第三，

和天然材料包括滑石相比，陶没有天然的裂纹，容易打磨，而且由于均匀细密，废品率较低。

此外，有些贝印还被单独嵌入金银制成的戒托，变成了戒指；有些则和其他装饰品一起，做成了项链、挂坠乃至耳环。上述贝印中，以金戒指出现的就有15枚。

贝印的其他特征如上釉、釉色以及是否穿孔也值得注意。在上述500多枚贝印中，明确表明上釉的为392枚，实际数目可能更多。因为有些贝印并没有标明是否上釉，加上缺少图片，笔者无从判断。关于釉色，以绿色和蓝色居多，黄色（包括棕黄）、白色次之，个别是黑色。此外，色彩似乎和时代也密切相关。贝印最繁盛的新王国时期，上釉基本是绿色和蓝色；而在此之前的第二中间期，贝印逐渐流行，上釉偏好黄色和棕黄色。

明确表明穿孔的贝印共278枚。这个数字不到全部藏品的一半，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贝印是穿孔的。统计数字偏小的原因是很多贝印没有标注穿孔，也没有图片可以查证。参照其他地区的藏品，笔者有理由认为，几乎所有的贝印都是穿孔的，这也是贝印的一个显著特征。之所以穿孔，是因为贝印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护身符使用的，甚至可以说，与其说是印，不如说是护身符。

关于穿孔，绝大多数是根据海贝的形状头尾通体穿孔，这样可以系绳悬挂，个别也有从较窄的腹部横向穿孔。

大英博物馆的藏印也为我们了解贝印的雕刻主题和风格提供了一扇窗户。从雕刻内容看，大致可分为文字印和肖像印。文字印多出现五种王名、王后名、神名以及贵族的字。经常出现的王名和神名包括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一世、阿蒙霍特二世、阿蒙霍特三世、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王后泰伊、阿蒙、贝斯、拉、塔沃里特等。

肖像印的主题有各种动植物，包括圣甲虫、蝎子、狮子、秃鹰、眼镜蛇、猫、公牛（头）、鱼、山羊、鳄鱼、狒狒、蝗虫、鸭子、莲（花、蓬）、纸莎草、棕榈枝等。其他物品还有刀、花瓶（Hes-Vase）等。

相当多的贝印印面既有文字又有图像，这和埃及的文字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有些符号既是摹形又是音节，如眼镜蛇、瓦吉特的眼睛、生命（Ankh）、哈索尔头像等。还有个别贝印是素面的，这可能是未刻之印。个别贝印从印面的内容和风格而言，属于后刻。以下不妨欣赏几件大英博物馆的藏品。

图14为碧玉（green jasper）制成之贝印，印面为莲花。^[1]长1.85厘米，宽1.23厘米，高0.52厘米，前后穿孔，时间约为新王朝时期。除了莲花，莲的其他部分也常常入印。

图15为鱼衔草肖像印。^[2]材质为合成物，绿釉，长1.69厘米，宽1.06厘米，高0.52厘米，穿孔，时代为新王朝时期；雕刻写实，朴素逼真。鱼衔草是贝印中颇为流行的主题之一，在大英博物馆有七八枚之多。

[1] https://research.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142080&partId=1&searchText=cowroid&view=list&page=1。2020年3月6日浏览。

[2] https://research.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142172&partId=1&searchText=cowroid&view=list&page=2。2020年3月6日浏览。



图14



图15

图16为一枚滑石肖像印^[1]。长1.5厘米，宽1.05厘米，高0.55厘米，前后穿孔；背部刻有棋盘状的点饰；印面为左右对称、直立的纸莎草（papyrus）丛。此印年代较晚，大约是公元前664至前332年间。以纸莎草为主题的贝印，其他博物馆也有收藏。



图16

图17为刻有新年祝福的贝印^[2]。材质为玛瑙，穿孔，长1.86厘米，宽1.21厘米，高0.72厘米；时代较晚，为晚期王国作品；印文为吉语“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位于英国利物浦的世界博物馆（World Museum）藏有21枚贝印，材质或彩陶或滑石，个别为红石髓，蓝釉或绿釉，大小和其他贝印相类，穿孔，印面有文字有图像；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大约半数为第十八王朝时期。^[3]

最新的考古发掘对贝印也有一些饶有趣味的发现。一个名叫“跨界”的考古项目对尼罗河的塞岛（the Sai Island）进行了挖掘。^[4]塞岛位于苏丹境内，是尼罗河在努比亚附近的最大的河中岛屿。岛上有新王朝时期的庙宇和众多的作坊。考古学者发现了大约是第十八王朝的一枚贝印（图18）^[5]。这是一枚肖像印，长1.7厘米，宽0.9厘米，高0.5厘米，前后穿孔，印面刻有埃及女神塔沃里特（Taweret）。塔沃里特的本意是“至高无上者（尤指女性）”，是埃及的生育保护神，保佑孕妇和新生儿。她的形象是一尊直立的雌河马，其特征是河马头、狮子脚以及鳄鱼背和尾。我们知道，海贝文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生殖崇拜，因此刻有生育女神塔沃里特肖像的贝印，无异于双重加

[1] https://research.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collection_image_gallery.aspx?partid=1&assetid=1321725001&objectid=142042。2020年3月6日浏览。

[2] https://research.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collection_image_gallery.aspx?partid=1&assetid=1146636001&objectid=142279。

[3] <https://www.liverpoolmuseums.org.uk/search/cowroid>。2020年3月5日浏览。

[4] <https://acrossborders.oeaw.ac.at/about/about-acrossborders/>。2020年3月5日浏览。

[5] <https://acrossborders.oeaw.ac.at/pregnancy-on-new-kingdom-sai-a-cowroid-of-taweret/>。2020年3月5日浏览。

持的生育护身符，对于佩戴者（应该是孕妇）有着格外的吸引力。



图17



图18

必须指出，贝印在埃及文明影响的相邻地区如巴勒斯坦也有发现，应该是埃及的影响所致。由于笔者水平和精力有限，此文不再涉及。

小 结

以上分析的贝印，虽然来源于考古或者是各大博物馆藏品，但信息真实可靠。毕竟样品偏少，难免挂一漏万，因此也不妨作一粗略的总结。

古埃及的贝印大致可分文字印（人名、神名、官名、吉语）和肖像印（神、人、动植物等），当然也有文字和图像兼有者。

那么，贝印的功能如何呢？古埃及的印章包括贝印，是其行政、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持久不息的文化传统，从日常生活到宗教习俗（包括葬礼）处处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因此，泛泛而言，和其他印章一样，贝印是权力、地位乃至财富（管理）的象征；而其雕刻内容也彰显了浓郁的宗教信仰（护身符、生殖崇拜、神权），宗教含义异常丰富，外来者很难深入体会。从上述分析的具体例子可知，古埃及贝印的政治功能特别是作为护身符的宗教功能最为突出，甚至掩盖了印章“凭信”这个原有的基础功能。不然，考古会有相当多的贝印封泥发现，而实际上虽然考古发现了不少的金龟子印封泥，目前却很少有贝印封泥的发现。此外，随身佩戴贝印的习俗也从侧面证实，护身符的功能大于印记的功能。当然，佩戴贝印也于有意无意之中增添了贝印的装饰功能。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个别为女法老和女性贵族雕刻的贝印，凸显了在男权社会中个别女性精英强烈的性别意识。她们借助宗教神话中的女性神祇，结合社会生活中女性在生育和家庭的关键角色，大胆地挑战父权制度的话语和安排，值得再三玩味。

古埃及的贝印在浓郁的宗教色彩中，也透露出了活泼的生活气息，如觅食的罗非鱼（暂且摒除罗非鱼的宗教角色）、手持棕榈枝以及鸭子和蝗虫的出现等。这些肖像印的创作，基本采取了写实的手法，朴素自然，艺术水平很高。釉色虽然主要为蓝绿二色，但色彩饱满，显得高贵典雅。

古埃及的文字（圣书体）虽然属于拼音文字，却有一些象形字的特点。它由表音字母、表意文字共同构成，并分为音节，有1000多个单独的文字图形。这些文字，有的颇似中国的象形文字，因而埃及的印章印文乍看很像中国的肖形印。正因为如此，古埃及印章的篆刻非常讲究谋篇布局，与中国印章篆刻的原则有相同之处，讲究平衡、疏密、动静。

古埃及的贝印与古代中国的官印尤其是玺印可作一粗略的比较，虽然两者年代相差实在有点远。若以明清的玺印而言，皇家玺印讲究规矩，制作有各种规章制度，皇帝和皇后之宝中规中矩，其主要功能是彰示皇权，缺乏个人色彩，也几乎没有宗教色彩。

古埃及文明中神话发达，宗教影响深远，因此，贝印所传递的宗教信息，包括政权和神权的结合、人神互动，丰富而复杂，微妙且特别；与之相呼应，贝印传递的个人色彩也极其鲜明。各种名称和头衔，凸显了主人的旨趣和愿望，令人惊叹。此外，相当多的贝印和圣甲虫印一样，穿孔佩戴，既有装饰和审美的作用，更有护身符的功能。后者是中国印章所不具备的特点。

至于治印的机构、治印的工匠、治印的规矩，由于缺乏古埃及的材料，恐怕无从比较了。不过，根据贝印形状、纹饰和雕刻，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古埃及恐怕也有一批熟练的印人为法老、王后、贵族、大臣等精英治印，技艺精湛，审美也相当高明。这样看来的话，古埃及应当有专门的作坊为王室或贵族生产和制作贝印（以及其他印章如圣甲虫印）；这个作坊恐怕也用来训练和培养学徒，传承手艺。

古代中国并没有类似的贝印。不过，先秦的中国，却不乏海贝以及用各种材料制作的仿贝。实际上，中国的海贝文化要早于大众引以为豪的玉文化。因此，笔者借讨论贝印这个机会，对古代中国的“贝”作一个节外生枝涉及古代文字的讨论，希望读者不至于觉得太为牵强。

中国先秦时期的贝

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考古在中国发现了大量的海贝。关于先秦时期的海贝，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中外学者有着长期的争论。争论的关键问题不外乎二。其一，这些海贝是从哪里来的？其二，它们的性质（功能）如何？^[1]绝大多数中外学者认为这些海贝是从南方（南海）来的；个别认为是从东南亚来的。唯有彭柯和朱岩石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结合海洋考古的研究，指出先秦中国的海贝不是从南方来的，而是从西北来的，而其最初来源很可能是印度洋沿岸。^[2]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为什么彭柯和朱岩石的研究与以往学者如郭沫若得出的结论如此相反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往的学者对考古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海贝”“贝壳”“贝”“贝齿”等不作生物学的分析。如本文最初所说，我们所谈的海贝不是大众所认为的海洋生物的外壳，而是某类特定的海洋腹足纲软体动物。先秦发现的海贝，主要还是本文提到的两种：货贝和环纹货贝，间或有子安贝（图19）。彭柯和朱岩石通过研究指出，历史上的南海，由于海水温度和盐度的原因，并没有这两类海贝的存在；既然如此，先秦的海贝，就不可能从南方而来。其次，考古发现表明，海贝在西北出现最早（新石器时期），而后逐渐向东南到了黄河中游（商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就逐渐消失了。海贝传播的这个地理空间分布说明，海贝是从西北向东南方向传播的。再者，考古发掘还表明，凡有海贝

[1] 关于先秦海贝的讨论，可见拙作 *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A Global History* (Routledge: 2019), 第六章。

[2] 彭柯和朱岩石 (Peng Ke and Zhu Yangshi), *New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owries in Ancient China*, *Sino-Platonic Papers*.68, 1995, www.sino-platonic.org/complete/spp068_cowries_china.pdf; 《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考古学集刊》卷12，第119—147页。



图19

处，必有青铜。也就是说，海贝和青铜是共生的关系，而青铜文化是从西亚传到中国的。这也佐证了海贝从西而来的路径。笔者完全赞同彭柯和朱岩石的结论，并且愿意把他们的结论往前再推一步：先秦的海贝确实（而不是可能）是从印度沿海向北到中亚再往东南传到黄河流域的；而印度的海贝其实是来自马尔代夫群岛。

马尔代夫一贯有千屿万岛之称，众多的珊瑚礁，温暖的气候，成为海贝的天堂，导致了天文数字的海贝（绝大多数是

货贝）的繁衍。从新石器时期开始，这里的海贝便逐级传到了亚非欧大陆。^[1]大约从公元4世纪开始，海贝首先在印度东北地区成为货币，而后向东传到阿萨姆、下缅甸、泰国；到了公元九至十世纪，马尔代夫的海贝在位于云南地区的南诏王国成为货币，并延伸至大理国和元明时代的云南，直到明清交替时期才消失。马尔代夫的海贝，在史前也传到了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大约在公元11世纪，西非地区的马里等王国开始用海贝作货币；等到16世纪初欧洲人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他们便用船把海贝运到欧洲，而后转运到西非。

海贝在上述地区成为货币，这也是货贝如此命名的原因。那么，先秦时期的海贝在黄河流域是否也是货币呢？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周时期，如果不是传说中的夏代的话，海贝便开始成为货币。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大约据司马迁而来。太史公在《平准书》中说“农工商交易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大致并列“龟贝金钱刀布”为货币。班固跟着司马迁，在《食货志》中枚举了“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这样，至少在汉代，人们就认为贝（贝壳）是上古的货币，虽然他们没有区分贝壳和海贝的异同。这种模糊的说法一直持续到了现代。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说珏册》中说：“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2]此后，考古中数以万计的海贝的发现和金文中数以十计的赐贝记录，更加强了这个观点。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是海贝，而不是金属的钱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个别学者如李永迪和笔者，则持反对意见。李永迪认为，虽然海贝在商周时期行使过货币的某些特定功能，但它们并不是货币。^[3]笔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认为商周时期海贝是中国最早货币的学者们经常使用的证据是金文材料。在西周，大量的金文文献记录了周王赐贝给诸侯的事。其模式往往如下：周王赐贝若干朋，诸侯“用做宝彝尊”。关于“用做宝彝尊”这句话，这些学者的解释基本上是：把赏赐的海贝用来购买青铜铸造这个宝彝；或者是把赏赐的海贝用来支付铸造的费用。这个释读望文生义，是根本性的误读。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Egami Namio）在1974年指出，“用做宝彝尊”这类的金文意思是“因此

[1] 关于马尔代夫的海贝，参见拙作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第二章。

[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说珏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1页。

[3] Li, Yung-Ti, On the Function of Cowri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 5 (2006) : 1—26.

而作宝彝尊”，或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诸侯）铸造了这个宝彝尊”（来记录这件事），并非是说“用海贝来支付”。笔者认为他的释读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周王赏赐最常用的海贝为什么只是贵重物而不是货币呢？

某种媒介（等价交换物）是否可以上升为货币，一个关键条件在于，这种媒介是否有持续性的供应，也就是供应问题。假如这个社会无法持续性地获得这种媒介，它自然无法为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和市场提供足够的货币数量，市场和社会也不会选择这种媒介作为通用的货币。海贝作为货币的候选者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海贝已经成为商周时期贵族拥有的贵重物品，成为价值和阶层的象征，也被周王赐予贵族来铸造鼎彝重器，甚至在个别情况下还直接用来买卖；可是海贝并没有成为在相当范围内流通的货币。所谓相当范围，一个是空间，比如说中原地区；另一个是阶层，海贝主要局限于贵族，没有在普通人当中流通开来。因此，海贝无法说是中国最早流通的货币。

换言之，海贝曾经是商周时期经济发展到需要产生货币时最有可能成为货币的候选物；可是，这种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最早货币的海贝，并没有实现这个转折。海贝没有成为货币的原因在于，这个货币候选物不能实现持续的供应，因为黄河流域离印度洋沿岸太遥远。因此，海贝在商周时期只能作为贵重物品出现。

作为货币的第一候选物，海贝解决不了来源问题。中原距离印度洋实在太远，途中要经历多个地区和国家，其运输和供应非常不稳定。正因为海贝强烈的稀缺性，所以商周时期各地区不约而同地用各种材料（青铜、玉、砗磲、骨等）来制造仿贝（图20—24）。而铜贝完美地结合了海贝和金属铜这两个货币候选物的优点，克服了来源问题，也就是稀缺性这一难题，成为中国最早的货币之一。

海贝虽然没有成为中国最早的货币，但它在中国货币史上刻下了深远的印记。首先，早在商代就出现了铜贝，也即用青铜来仿制海贝。铜贝，特别是鎏金铜贝和玉贝的出现，表明了海贝的稀缺和昂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终于实现了铜贝向货币转变的过程。楚国的蚁鼻钱（也称鬼脸钱），就是铜贝的变形。

铜贝虽然早在商代就出现了，但直到周代才开始流行^[1]。不过铜贝在最初也不是货币。^[2]话说回来，虽然起初铜贝并不是货币，但铜贝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货币^[3]。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大国都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三个货币地区：北方黄河中游的布币、黄河下游的刀币以及长江中下游楚国铸造的铜贝。

楚国铸造的铜币（图25—26），椭圆形，正面突起，背磨平，人们因其正面仿佛鬼脸，称之为鬼脸钱；又像蚂蚁的鼻子，也称蚁鼻钱或蚁头钱；而钱币学家称之为货贝钱。这种铜币，学者们认为是铜贝，是根据真实的海贝形状而仿制的。早在1888年，法国东方学者Terrien De Lacouperie 就明确指出，鬼脸钱或蚁鼻钱不过是海贝的替代品罢了。

[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7页。

[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8页。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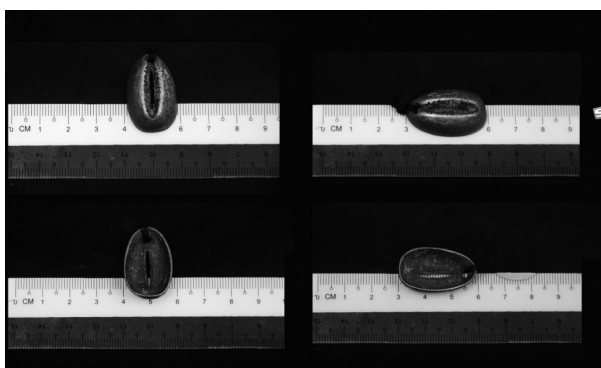


图20 铜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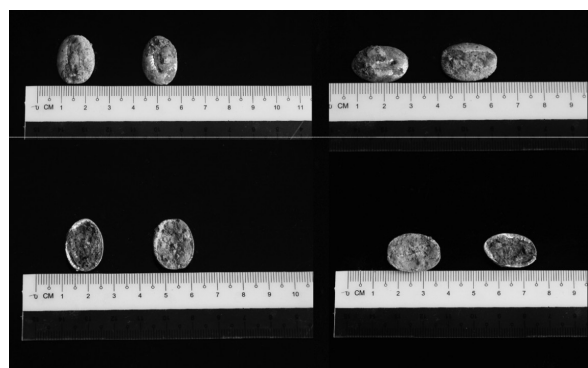


图21 鎏金铜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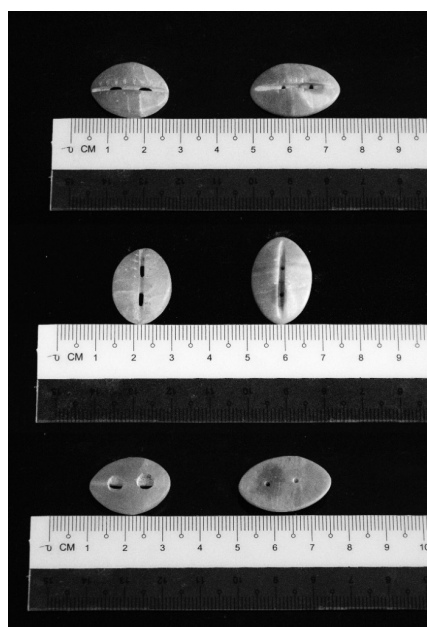


图22 玉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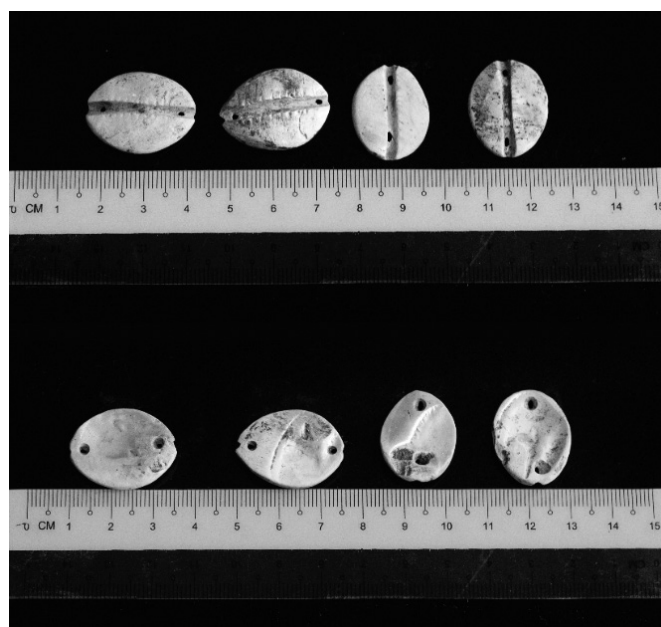


图23 砗磲贝



图24 骨贝（染色）



图25 楚国蚁鼻钱（一）



图26 楚国蚁鼻钱（二）

战国时期的楚国曾经铸造了大量的铜贝，这也是铜贝为什么是货币的证据之一。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个铜贝的铸模（图27），可兹为证。毫无意外，考古也发现了大量的楚国铜贝，其流通范围遍及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据不完全统计，100多处的遗址共发现货贝钱15万多枚。^[1]每处的数量或多或少，少则一枚至十几枚，多则数千枚。湖北曾经有一次5000枚货贝的发现。^[2]而最多的一次发现是在山东，发掘出多达15978枚的蚁鼻钱。铜贝的重量大小不一，轻的0.6克，重的5.65克，平均为2克；多数货贝长不过2厘米，宽不过1厘米，高在0.3至0.6厘米之间^[3]。货贝钱这个大小，和真实的海贝是一致的，同时和先秦时期各种仿贝相吻合，也和古埃及的贝印大小基本一样，表明了货贝钱确实是一种仿（海）贝的货币。

和南方比，北方也有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的痕迹。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布币，上面往往有字，其中就包括“贝”字（图28），虽然数量稀少。中国最早的货币，虽然是金属货币，可是，无论在南方和北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海贝对它们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是海贝作为上古货币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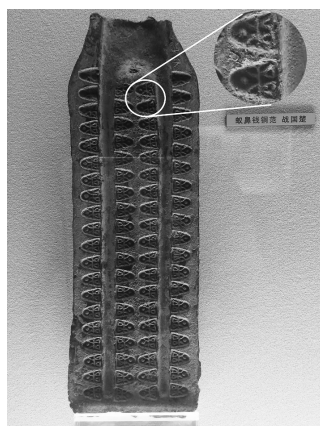


图27 蚁鼻钱铸模



图28 “贝”字布币

[1] 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4页。

[2]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3] 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第230—235页。

秦灭六国后，除了秦半两，六国的钱币包括货贝钱都被废除。不过，200多年后，复古的王莽决定仿周代的货币制度，“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也就是以金、银、龟、贝、钱、布这六种材质为货币，而其中非金属材质的龟（龟壳）和贝（贝壳）都是传说中上古的货币。我们不妨看看王莽关于贝的规定。^[1]

王莽把贝壳按照大小分为五类，“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这样看来，王莽的贝是按照尺寸来定价的。尺寸越大，价格越高。如此，则王莽所说的贝就是人们泛泛而言的贝壳，并非本文讨论的海贝（cowrie shells）。此外，王莽虽然认为海贝是上古货币，但他却把商周最宝贵最流行的海贝，也就是体积最小的货贝和环纹货贝归为最廉价的第五类。实际上，王莽的币制改革没有执行，也无法执行，考古也从未发现王莽所说的龟钱或贝钱。王莽币制改革中的贝也不过是海贝为货币这个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已。

“𧇧” “𧇨” “海𧇧” 和 “考黎”：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贝”

上述讨论和古埃及的贝印毫无关系，偏离了本文的主题。不过，如笔者所提及，古埃及的贝印是仿制印度洋特别是马尔代夫出产的海贝（货贝和环纹货贝）；而先秦时期的海贝，其来源也是印度洋。因此，无论是古埃及的海贝和贝印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还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海贝、各种仿贝以及海贝文化，都指向了印度洋（特别是区区岛链马尔代夫）对于两大文明古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不放在跨地区跨文明的视角下，很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印度洋的海贝对于中国的影响不仅从北方的草原之路而来，也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而来；不仅对上古中国有影响，对元明清的中国也仿佛窗纱透过来的月光，令斗室生辉，使人有无限遐思。

对于各种贝类，无论淡水产的还是海水产的，古代中国均以“贝”命名之，这个名称从上古一直持续到元代。到了元代，由于中国人辗转乘船航行到印度洋地区，亲眼见识了马尔代夫的特产海贝，以及在孟加拉国和东南亚许多地区使用的贝币，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从而把海贝引入了中国的词汇和文化当中。

元代商人汪大渊（1311—1350），曾经两次从泉州出发航行到西洋各国，也曾经到过马尔代夫（他称为北溜）。他在其著作《岛夷志略》中记录，北溜“地产椰子索、𧇧子、鱼干、大手巾布。海商每将一船𧇧子下乌爹、朋加刺，必互易米一船有余。盖彼番以𧇧子权钱用，亦久远之食法也”。^[2]他说的𧇧子就是海贝。“𧇧”字是新创的形声字，以“贝”旁表示性质，以“八”为音。

到了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溜山国”条中对当地海贝也作了记录：“海𧇧，彼人采积如山，腌烂其肉，转卖暹罗、榜葛刺等国，当钱使用”；在榜葛刺（孟加拉国），“街市零用海𧇧，番名考黎，亦论个数交易”^[3]。这里，马欢不但沿用了汪大渊的“𧇧”字，而且

[1] 班固：《汉书·食货志（下）》。

[2] （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

[3]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中国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74、86页。

还在前面加了“海”，明确指出这是海洋所产。同时，马欢指出“海贝”也就是海贝，在印度叫作“考黎”（也以造字法新创了形声字“喀嚟”）。

与此同时，由于海贝在云南长期作为货币，当地把海贝也叫海贝或贝子。元代李京曾到云南为官，他在《云南志略》中就说：“交易用棋子，俗呼为肥。”这里的“棋”字当是“贝”，而“肥”和“贝”一样，都是新创的形声字，两字在关于云南贝币的元明清文献中经常混用。^[1]肥、贝二字并行，表明在元代的云南，人们很清楚肥就是贝。

综上所述，到了元明时期，对于海贝的称呼，中文中除了原来的“贝”之外，还出现了“贝子”“海贝”以及“考黎（喀嚟）”。后三者都是外来词，可以说是受印度洋海贝文化的影响。

首先，无论“贝”还是“肥”，发音虽然和“贝”类似，但其来源实际上和中文中的“贝”无关。这两字大致都念“ba”音，其实是梵文 kaparda（贝）及其变体 kapari 的音译。^[2]而“ba”的发音又和占婆语（Cham）的“bior”、高棉语（Khmer）的“bier”、泰语和老挝语的“bia”以及马来语的“biya”吻合。^[3]而“考黎（喀嚟）”一词，则和英文“cowrie（cowry）”一样，是从印度语（Hindi）“kauri”或“cury”而来，后者同样可以追溯到梵文 kaparda。因此，语言学的分析表明，以上几个元明时期中文文献中出现的有关“贝”的名称和文字，在中文中只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它们是中印两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碰撞产生的现象，是海贝文化留下的蛛丝马迹。

本文为澳门大学科研项目Exodus to China: Ne zha Reborn from the Lotus（MYRG2019—00060—FSS）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李家瑞：《古代云南用贝的大致情形》，《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第85—102页。

[2] Egami Namio, “Migration of Cowrie-Shell Culture East Asia,” Acta Asiatica, vol. 26（1974）: 34.

[3] Paul Pelliot（伯希和），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English version, 1959; 554; Egami 34. “bior”诸词都是贝的意思。